

4

江西文史資料

2

198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省政协第六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主任：刘玉瑞

副主任：王培元 姚公骞 张玉龙 刘少屏

委员：乐典 陈言 秦光杰 辜石如 蔡智传

王兆荣 毛士博 左行培 杜德凤 吴吉如

徐海秋 黄干周 彭适凡 廖云龙 熊仰华

刘勉玉 许怀林 朱祥清 余伯流 吴芝轩

张允建 陈荣华 熊幼松 樊昌生 聂国柱

本刊主编：刘少屏

副主编：聂国柱

编辑：曾粮 雷心刚 吴鸢 郑永昌 易芳霖

张晔 邹新元

本期责任编辑：曾粮 雷心刚

目 录

抗日篇	抗战时期的赣粤边	刘建华 (1)
	日本人“反战同盟”在新四军活动情况	朱 勇 (46)
	解押日军战俘的回忆	徐文华 (51)

革命史·邵式平访问革命老根据地..... 郭永昌 (30)

人物述林	邹恩源智拥彭程万出任江西都督始末	吴威亚 (54)
	忆著名爱国教育家陈鹤琴	肖建中 (62)
	春风永驻 教泽长存 ——记涂闻政先生及其南昌乡师办学事迹	刘光德 (66)
	忆京剧表演艺术家肖长华	梁镇国 (83)
	瓷器实业家陈庚昌	罗水生 (89)
	近代江西实业界青宿——刘景熙	杨宇清 (94)

·文化篇· 江西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四十年..... 黄源海 (97)

政坛旧忆	江西民主自卫军第五纵队始末	陈 言 (111)
	我在修水做策反工作的回忆	张任石 (120)
	“武功山区联防办事处”的出笼与归宿	彭文程 (125)
	赣湘咽喉万花筒 ——回忆抗战期间的界化垅	罗自强 (129)

交通史料	李烈钧对江西早期公路的建树	罗永权 (141)
	杨绉庵与江西驿运	许立民 (145)
	民国时期江西航道整治的回溯	沈兴敬 (149)
	南昌市水陆运输码头整理始末	杨竹森 (156)
	江西航运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许立民 (167)
	高路入云端——记井冈山登山公路	陈文振 (176)

社会内幕	韩复榘被捕目击记	唐志华 (180)
	甘溪情报站情况点滴	汤 沸 (184)

·补白· 九岁红演京剧盘肠大战..... 梁 澄 (140)

· 抗日篇 ·

抗战时期的赣粤边

刘建华

(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了。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的信丰、大余、南康、赣县、全南、龙南、定南、上犹、崇义和粤北的南雄地区坚持斗争的我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中断了和党中央的联系已近三年，无法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当时，对于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政治主张，主要靠地下党断断续续送来国民党报纸和香港出版的书刊，从字里行间来判断和了解。

芦沟桥事变发生许多天之后，我们才从报纸上了解其真相。项英、陈毅同志判断抗日高潮即将到来，必须相应地转变我们的斗争任务和口号。于是就决定先由项英同志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芦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文章指出：芦沟桥事变的发生，使发动全国对日作战的可能性增多了。我们的任务是力争抗日的前途，迫使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为此，我们表示愿意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特委把这篇文章印发给赣粤边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学习讨论，同时想方设法打破封锁，以获取党中央的指示。

7月底，一位同情我党的乡村教师给我们买来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其中一篇署名文章，论述中国的各党派。文中引述了毛泽东同志1937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三个小段。我们才知道党中央曾经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内部变动，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项英、陈毅同志收到这本小册子，如获至宝，作了反复细致的研究分析，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和措施，以配合党中央促成南方国共联合抗日局势的到来。当即由项英同志写了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长篇文章，分析形势，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解放。文章还指出，第二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着不同的特点，我们有红军，在统一战线中严格坚持三项原则，即保持党在苏区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保持党在国共两党关系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我们将在这三项原则下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以期实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为此，我们的工作方式要彻底转变，力求公开、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在赣粤边党和游击队内部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都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而振奋。但开初相当一部分干部和战士持怀疑态度，认为跟我们打了十年内战，至今还在进攻我们的国民党，不可能和我们合作，不要上当受骗，被人家消灭。也有少数干部和战士产生了松懈情绪，认为国共合作了，可以解甲归田，不用再在山上受苦了。项英、陈毅、杨尚奎等领导同志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终于克服了不正确的认识，统一了党内军内的思想。同时，向游击区的基本群众作了宣传解释。

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在统一内部思想的基础上，于1937年

8月8日联合发表了《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郑重宣告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赣粤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主张和地方政府联合抗日，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的“进剿”，允许抗日自由，并采取最低限度的安定民生办法。8月15日，特委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人民团结抗日，指示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停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对行动，拥护团结抗日。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允许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等政治口号。8月20日，又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党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江西省第四区（赣州）行政督察专员马葆珩，希望他们立即作出响应，以配合全国抗战大计。稍后，又分别给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的国民党政府和社会知名人士写信，呼吁他们消除歧见，以实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这些宣言文告和函件，通过游击区的保甲长送往国民党政府机关和驻军，通过游击区人民群众上城赴圩，走亲访友，散发各地。红军游击队的各部队则广泛开展武装宣传活动。各地的游击小组（群众组织）用竹片木板写标语，插在交通要道，投入江河，任其漂流到城镇，流至赣州城，向国统区的广大人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可是，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区署、联保办事处、驻军、民团以及地主豪绅却乘机散布谣言，胡说什么共产党归顺政府、游击队投降了。他们写来许多信，要游击队员下山“自新”，还通过叛徒来“招抚”，表示可以收编，也允许回家耕田。企图制造混乱，瓦解我游击队。我们不得不由“枪战”转入“舌战”、“笔战”，揭穿谣言，据理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谰言，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反共政策，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否则我们将拒绝接谈。

经过反复斗争，同时由于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改变腔调。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四县县长联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

很敬佩。现在是志士抗日之时，欢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8月27日，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发来“简秘代电”，对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表示同意并约我们派要员去接谈。

接到“代电”后，项英、陈毅和特委同志慎重地作了研究，决定陈毅同志为全权谈判代表，并遵照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三原则，拟定了七项谈判条件，即①立即停止对游击区的“清剿”，撤退进攻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②红军游击队番号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保持独立的建制；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保障言论和行动自由；④释放政治犯，解散一切反共组织；⑤实行政治民主，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⑥保障游击区群众利益，不准地主豪绅追缴以前的租税债务，不得有报复行为；⑦采取最低限度的安定民生的办法。而我方则保证停止反对政府的行动，停止打土豪，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联合抗日。

9月3日，陈毅同志复函彭育英，阐述了我方的立场和谈判态度，并依约在梅岭南麓的钟鼓岩（广东南雄境内）会晤了彭育英，商定了正式谈判的时间和地点。这是经历十年内战的隔离后，赣粤边国共两党重新恢复接触的开始。

9月8日，在大余县池江区署会议厅举行了首次正式谈判，达成初步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止军事敌对行动，确定青龙、池江、新城一线不驻兵，国民党驻军后撤，以保证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的安全；下山后游击队的给养由大余县政府负责解决。至于我方提出的其他条件，对方代表作不了主，决定去赣州谈判解决。

9月11日，陈毅同志由彭育英陪同乘车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继续谈判。国民党当局原安排陈毅同志住宿在米汁巷专员公署，陈毅同志说：“我们不住道台衙府”，改住中华旅社。谈判开始，国民党方面避而不谈政治问题，只谈游击队改编问题，妄图否定国共合作的前提。陈毅同志针锋相对地点破了对方的企图，据理批驳了对方的谬论，终于达成协议，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

平等地位，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抗日主张，保障抗日运动，释放政治犯，保障游击区群众利益，安定民生等条件。同意由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电令第三（吉安）、四（赣州）、八（宁都）行政区各县停止武力“清剿”，为各地游击队集中改编提供通行方便，并接受我方的改编方案，达成如下具体协议，即游击队于9月底在大余池江集中，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由国民党政府派员参加点名，改编后的一切经费给养，由江西省政府拨给，待遇和保安团官兵同等，抗日义勇军的干部，由游击队提名报省政府委任，游击队改编后保证严守纪律，执行政府法令，维护地方安宁，其它具体事项派代表随时与第四行政区（赣州）专员公署商办，湘鄂豫皖闽浙粤赣八省游击队由项英、陈毅负责召集下山改编。对于我方提出的向延安我党中央通电话一事，对方借口“怕影响国际关系”而予以拒绝。

赣州谈判达成协议后，“进剿”游击区的国民党四十六师和江西保安团相继撤走。各地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9月下旬，在大余县池江圩公园内设立了江西抗日义勇军池江办事处（后改名为新四军大余办事处），由贺敏学同志担任主任。办事处以公开合法机关的地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联络接待来往人员，并负责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办理部队有关事宜。同时，特委通知各县委、区委根据赣州谈判协议，与当地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9月24日，项英同志应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电邀，抵达南昌，同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解决了南方其他地区游击队的改编和赣州谈判未决的问题。项英同志到达南昌后，经过力争，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和叶剑英同志通了电话，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与请示。至此，我们终于恢复了同党中央的直接联系。项英同志后来对我们说，当时他的心情激动不已，好似重见天日，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从此，我们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抗日民族战争的胜利而奋斗。项英同志还会见了八路军驻南昌代表顾建业，从他那里得到了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中央文件。项英同志在谈判

结束后，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10月1日返回大余。途经赣州时，在中华旅社接受记者采访，发表了谈话。在南昌期间，项英同志还将方志敏夫人缪敏同志从南昌军人监狱营救出来，一同返回大余，安排在大余县平民医院治疗疗养。

随后，陈毅、项英同志相继离开赣粤边。10月3日，陈毅同志经兴国前往吉安、南昌，再去湘赣边游击区传达指示，召集游击队下山改编。皖浙赣边区与陈毅同志取得联系后，也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10月23日，项英同志奉命去南京会见博古同志，商讨抗日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事宜。因为10月2日中共中央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1月7日项英同志由南京抵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陈毅、项英同志走后，由杨尚奎、陈丕显同志负责赣粤边游击队的集中整编工作。池江谈判达成协议后，油山和北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首先下山。开始，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信康赣游击队和油山游击队暂驻信丰潭塘坑，北山游击队暂住南雄中洞，随着形势发展，再逐步向山外移动。10月上旬，这三支游击队在大余杨柳坑段屋会合，共有二百余人，整编为赣粤边抗日义勇军。然后开到大余池江章江南岸驻扎在板棚下、弓里、小汾等几个村庄，一面进行军政训练，并开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一面派出小分队到各村庄和圩镇开展抗日宣传和扩军工作。板棚下、弓里、小汾等村庄开辟了练兵场，建立了抗日救亡室。同时派出干部去联络赣粤边其他地区的游击队和原中央苏区留下的人员。三南地区的游击队与特委的联系已中断了一个时期，那边还在战斗。10月下旬，陈丕显同志几经周折，才找到三南游击队，向他们传达了特委的指示，转交了项英、陈毅同志的亲笔信。三南游击队遂与驻扎全南陂头的国民党保安大队谈判，停止了敌对行动。三南游击队在全南县杨梅石集中整训后，于11月间由政委张日清同志率领全队百余人来到池江集中改编。这时，在池江地区集中的赣粤边游击队共三百余人。特委

还派人将项英、陈毅同志的亲笔信送往湘南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已中断联系二年多，他们接到指示信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上旬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集中整训。1938年1月，这支游击队由游世雄、方玉明、王赤率领也开到池江改编。在这之前，陈丕显同志曾去瑞金向闽赣边游击队传达指示，这支游击队也来到池江参加改编。特委派我带一随员去寻乌县找当地的游击队。在寻乌会见了当时的县长李日东。他是兴国人，态度还好。我说明来意后，他满口答应派人去打听游击队的下落。其实也不靠他打听，我是寻乌本地人，很容易就调查清楚；寻乌党的工作已全部搞垮了，确实已没有游击队，我便返回池江。特委还派了一些干部去原中央苏区的各县，联络长征后留下的党员，恢复党的关系，组织留在苏区的原红军战士归队。留在苏区的这些党员和红军战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度过了艰难的三年，现在重新找到了党，其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他们中许多人纷纷来到池江办事处，要求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参加部队。游击区和原苏区的青壮年也踊跃前来参军。在集中整编待命的五个多月内，我们的部队便由四百多人扩大到七百多人了。游击区的人民掀起了慰劳抗日义勇军的热潮，仅1938年春节期间，信丰、大余、南康、南雄等地就送来了几百担鱼肉、花生、黄元米果，一千多双军鞋以及其他慰劳品。春节过后，三南游击区的人民组织了二百多担慰劳品，跋涉数百里，肩挑来到池江慰问义勇军，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厚情谊，我们都深为感动。这时的池江真是热闹非凡，红旗招展，战歌嘹亮，被誉为“小延安”！

1938年1月，项英同志从延安回来，1月6日在南昌成立了新四军军部，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确定新四军的编制序列为四个支队九个团和一个特务营。在池江集中的赣粤边游击队七百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的第二营。湘南游击队三百多人改编为第三营的一部。陈毅同志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同时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二、三营,告别了赣粤边的乡亲父老,在万众欢送声中,从池江出发,途经赣州、樟树、玉山,开赴皖南抗日前线。这时,我又一次接受党组织的分配,留在赣粤边地方工作。

(二)

新四军开赴前线之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了加强和扩大赣南革命战略支点,撤销赣粤边特委,成立了中共赣南特委,隶属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领导(1938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成立,赣南特委划归江西省委领导)。赣南特委由杨尚奎任书记,严仲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钟平任组织部长,危秀英任妇女部长,朱平任青年部长,凌保成任民运部长。党中央为了加强赣南工作,还在1937年至1938年初,先后从延安派来十几名参加长征的干部,记得有钟平、危秀英、朱平、凌保成、钟梅生、王星楼、李国屏、黄华芬、余庆桓、何功良、李克浩、刘蔚文、李通顺等。

赣南特委成立后,于1938年2月2日至6日,在大余县池江乡弓里村的屋背祠堂召开了第一次特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特委委员外,还有信丰、大余、康赣、信南(同年5月改为三南县委)、南雄、赣县、于都、兴国等县委、资汝桂中心县委和上犹、崇义工作团的负责人,共五十多人。项英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指示精神。陈毅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分析了赣南的政治形势,对新四军开赴前线后的地方工作可能出现的问题均作了估计。会议确定新四军开赴前线后赣南特委的总任务是巩固原来基础,发展新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保卫江西,巩固抗日后方。并制定了五项工作方针,即从各方面开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纠正“左”的关门主义;广泛发动和组织赣南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大量发展党的组织,特别要发展兴国、

于都、赣县的党组织，加紧训练干部和提拔新干部，建立和恢复赣南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加强特委的组织领导，建立党的上下层领导机关，加强对下层党的工作指导。会议还指出，新四军开赴前线后，赣南形势可能发生某些逆转，比如少数顽固分子乘机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地方当局可能利用各种借口来刁难我们的工作，少数干部在和平环境下可能产生消极情绪。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特委的预见是正确的。会后，特委派出一批干部去加强各县的领导。我先得派去担任中共信丰县委书记。1938年秋又调任南雄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6月调回赣南特委任组织部长。

1938年这一年赣南的政治形势比较好。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比较融洽。赣州行政督察专员马葆珩、大余县长彭育英、南雄县长英雄、信丰县长李培春都是开明分子。这几个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许多区署、乡公所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派了一些常驻代表，共同协商有关事宜。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可以用共产党名义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允许开办进步书店，公开出售《新华日报》、《群众报》等进步书刊。国民党地方当局也能够接受我们的某些要求和建议，比如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大余、南雄、信丰内战时期被捕的人员大部分释放了，我离开信丰时只剩下少数人员未释放，正在继续交涉。各地的铲共团也相继解散，而代之以抗日民众武装。内战时期的标语洗刷了，代之以团结抗日的标语。我们常派代表参加地方当局召集的有关会议，派干部参加抗日救亡团体工作，共同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我们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批驳破坏团结抗日的言行。南京沦陷后，我们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曾经共同开展了反对投降妥协巩固团结抗战的宣传运动，县区乡都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党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人民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当发生纠纷时，我党和地方当局共同派代表前往实地调查解决。龙南曾经发生一起反共顽固分子暗杀我方工作人员的事件，当地群众要求政府依法制裁，经双方代表前往实地查明真象，龙南县政府逮捕

了为首罪犯，判处罚款，抚恤被害人员的家属，并发布通告，严禁各地再发生类似事件，还在当地召开了群众大会，揭露和批判了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这是新四军上前线后对反共顽固派的第一次打击，推动了龙南县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在信丰，有个乡长也是反共顽固分子，他贪污义仓谷七百多担，农民十分气愤，十多个保长，六十多个甲长和七百多名农民联名告状，要求政府严办。在我们的推动下，信丰县政府将这个乡长撤职查办，追回赃谷，将其中一部分留作义仓，一部分发还缺粮农民渡荒，一部分用作优抚抗属，并召开保甲长联席会议选举新的乡长，以保为单位成立了抗战后援会，促进了群众工作的发展。在信丰部分地方，还以乡为单位成立了调解委员会，由国共双方代表和群众团体代表组成，共同调解地方上的纠纷，以巩固团结抗战的基础。信丰县九渡水和禾锹陂两地曾经爆发肖胡两姓的械斗，通过调解委员会拟定了和平互让办法，为双方接受，从而消除了械斗，维护了地方安宁。国共合作后，地主豪绅返回游击区居住，夏收时，有些顽固分子竟然向农民追索内战时期的老租旧债，与农民发生冲突。在调解委员会上，我方代表据理力争，严正指出，为了顾全大局，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团结抗战，我们共产党人和农民已作了最大的忍让。停止敌对行动，停止打土豪，这是双方的协议，不交老租旧债也有双方的协议。你们为何违反协议？如果你们不执行协议，那么我们也可以不受协议的约束。想要取消农民流血牺牲取得的权利是办不到的。地主豪绅一方面理亏，一方面考虑利害关系，国民党政府尚不敢撕毁协议，只好作罢。经过斗争，我们维护了农民利益，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我们的努力，抗日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在信丰、大余、南雄等县的党政机关部门、交通邮电部门、教育卫生部门和社会团体内都建立了统战关系。保安十五团、大余警察局也有个别的统战关系。但多数是在区乡保甲和乡村小学等下层组织。信丰的大小窝、小江、小河，大余的池江、新城、黄龙，南雄的里东、乌迳，兴国的高兴，这些区的区长都和我们建立了统战关系。

这个时期赣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比较活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遍布城乡。主要团体有抗敌后援会，它原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团体，县区设有机 构，但没有基层组织，而国民党政府又是包而不办，使其徒具形式。我们通过广泛建立农村、城镇、矿山的抗敌后援会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信丰的原游击区内，普遍以保为单位建立抗敌后援会，以甲为单位设立抗敌后援小组。大多数由保长兼任主任，我们的党员担任副主任或干事，实际上是我们党在领导。参加群众数以万计。每逢“九一八”、“七七”、“八一三”，都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并协助政府开展战争动员，维护治安，劳军优属，宣传抗日，普及文化等项工作。1938年上半年，仅一次劳军运动，就收到五千多封慰问信、三百多双军鞋、二百多双袜子、四百多条毛巾。这些慰劳品，一部分送往新四军，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的后方伤兵医院，我们在信丰还组织了一次慰劳抗日军人家属的活动，群众送来几十担慰劳品，按保召开抗属联欢会，请政府派人参加，我方代表在会上报告前方胜利消息，政府代表宣布县政府接受我党建议制定的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主要内容有抗属免征工役，免交临时捐税，免收老租旧债，新租减半，免交学费，由保长轮流派工帮助耕作等。国民党政府征兵，一贯采用捉拉壮丁的办法，群众抵制，或者壮丁外逃，或者上山为匪。在战争动员工作中，我们帮助国民党当局改变这种流弊，纠正征兵中的不公平现象，惩办营私舞弊的征兵人员，采用鼓励报名，优待军属的办法，通过抗敌后援会去动员壮丁自动报名应征，组织群众欢迎新兵入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抗敌后援会还发动了识字运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开办妇女识字班，对妇女的政治启蒙工作做得比较好，参加人数很多。识字班里既识字、学文化，又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教唱抗日爱国歌曲。在城市、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学校、商店则发动职工、店员、教员、学生建立工余俱乐部、工余歌咏团、合唱团、夜校、读书会、时事讲座，宣传团结抗日、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保家乡》、《最后关头》、

《凤凰城》、《塞上风云》等抗战戏剧。赣县还成立了赣江木船救国会、赣江木船业工会，会员达千余人。大余县的几个钨矿成立了矿山抗敌后援会筹备处，但为国民党当局阻挠，未能正式成立，改为成立工人同乡会。

在广东南雄，还有一个主要的抗日群众团体，就是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这是我党直接领导的一个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省、县设有队部，学校、乡镇设有基层组织。当时的南雄县长莫雄比较开明。有一次，他在湖口乡公所会见我党南雄县委书记袁达郊时，向我们要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那时我们党内刚传达下来，便给了他，过了几天他向我们表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论点和主张，要求印发给全县官员阅读。他对抗日救亡运动给予热忱支持和众多便利，所以“抗先队”在南雄发展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初以城市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店员为主，后来发展到农村，各区乡都有基层组织，到我1939年6月调离南雄时，全县抗先队员已达七千多人。我党派了许多党员去领导各地的抗先队。在县城上米庙还召开了全县抗先队代表大会，成立支队部，选举共产党员董天锡为支队长，共产党员徐道昌为组织部长，党外进步人士丘应扬为宣传部长。抗先队的主要活动是，组织队员深入城乡宣传抗日救国，每到一地便进行街头演讲、戏剧演出、写标语、画壁画、募捐，慰劳后方医院伤病员，举办读书会、夜校、识字班，对青年、妇女、儿童进行抗日教育和文化学习，以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我们还在抗先队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还有一个机构，叫做广东银行战时乡村服务团南雄工作区，群众简称为农贷部，办事处设在湖口圩，负责人李曼君是共产党员，我们也派了一批干部参加这个机构的工作。它的任务主要是向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发放贷款，扶助农村发展经济，同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工作区集资开办了大众书舍、轮回书库、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编印了民众读本，记得其中有一课的内容是：“火火火，东洋鬼子的火！有钱人到香港，穷人走不

了，千千万万的人民要抗日，不做亡国奴！”这个油印读本，广泛散发给群众阅读，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赣南，我们党积极支持和参与“工合”运动。这个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和我国爱国人士胡愈之、沙千里、徐新六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得到我们党中央支持、周恩来同志亲自指导的一个社会团体，是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它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国共合作，争取国际援助，发展战时经济，支持长期抗战，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服务”。1938年9月，艾黎来赣州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东南区办事处（简称“东南工合”），办事处设在城内西津路中华圣公会内。共产党员孟受曾由我党安排、经“工合”总会派来赣州协助艾黎工作。赣南特委先后派了薛景扬、张石仁（即邓勋芳）、李福海、笪移今等同志进入东南工合工作，并先后在东南工合内部成立了我党的支部和工委。还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赣南各地“工合”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东南工合在赣南的赣县、兴国、于都、瑞金、宁都、龙南等十个县设立了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发展了包括四十多种行业的二百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拥有三千多名社员，后来还发展到九连地区的广东和平一带。形成了一支独特的社会经济力量。它生产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杂品、食品、文具、造纸、酒精、药棉纱布、印刷、五金机械、交通、钨砂、毛铁、土糖等。有军需品也有民用品，有生活资料也有生产资料。“工合”三角标记的产品，在前方后方都受到赞誉。通过“工合”，不仅发展了战时经济，安置了难民就业，增强了抗战实力，支援了前线，而且，团结了群众，团结了国内外进步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南工合通过举办专业训练班，出版《东南工合》、《工合战士》等杂志，开办夜校，举办时事讲座，开展文体活动等形式，经常对社员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工合”还成为我党的工作据点和联络点。我党的赣州市委机关曾经一度设在东南工合办事处内，一批

党员和干部以“工合”职业为掩护，一方面支持推动工合事业的发展，起骨干作用；另一方面开展党的工作，扩大了我党的力量和影响。

随着战局的变化，江浙一带的文化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纷纷流亡到赣南，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通过我党的领导和组织发动，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很活跃。当时，在赣州专员公署的动员委员会、抗日宣慰工作团、抗敌后援会、妇女指导处、抗日救亡演剧队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团结群众，开展了歌咏、戏剧、美术、演讲等多种形式的抗战宣传活动。赣州专署动员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动员旬刊》，有两名共产党员做编辑工作。他们经常用改写的方法，转载《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传达党中央对时事的看法，批驳妥协投降思潮，指导抗日救亡工作。我党还派了共产党员吴越到赣州专员公署领导的“青年文化服务社”担任经理，从桂林、重庆的生活书店大量购进进步书籍，公开出售，并发行中共广东省委的半公开机关刊物《新华南》半月刊。服务社设立了阅读部，陈列进步书刊供群众阅读。

我们还建立了一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广州沦陷后，南雄县长英雄找我们商量，要求我党协助制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计划。他组建了第二十三游击司令部，粤北党组织派了共产党员郭晖去当参谋。赣南特委派共产党员刘邦华同志去组建脱产的壮丁常备队第三中队，担任中队长，有一百多人，排长以上的干部和大多数班长都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武器和军饷由第二十五游击司令部拨给。实际上是我党的一支抗日民众武装力量。当时各地由共产党员领导的不脱产的壮丁队有十多个中队。

在这期间，党的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内战结束时，特委管辖下只有信康赣、南雄、信南等三个不健全的县委和十一个区委、三十多个支部、三百余名党员。经过一年多的整顿、恢复和发展，由三个县委发展为八个县委（资汝桂中心县委已划归湘南特委领导）和二个工作团，即信丰、南雄、大余、南康、赣县、于都、兴国